

道德的困局和出路

——道德社会学的启示

曹金羽

内容提要：道德问题一直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从涂尔干到鲍曼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道德问题的理解。道德在随着现代性的崛起逐渐走向困局，这其中尤其以理性主义、科层制和商品经济对其影响最大，面对道德困局哈贝马斯提出通过建立交往理性重新建立道德的合法性基础，利奥塔则从元叙事危机下讨论了后现代道德的生存状况，并对走出道德困局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二者为道德所指出的道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道德问题，在这里本文认为道德问题要想走出困境必须利用涂尔干的“职业群体”与鲍曼“为他者负责”相结合，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共同建立道德的良好范围，为道德指明出路。

关键词：道德 道德社会学 道德困局 现代性 职业群体

时下道德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道德滑坡”、“道德崩溃”、“道德危机”等等言论铺天盖地。

“道德……正在经历着骇人听闻的危机和磨难。……转眼之间，我们的社会结构竟然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其速度之快、比例之大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与这种社会类型相适应的道德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力，而新的道德还没有迅速成长起来，我们的意识最终留下了一片空白，我们的信仰也陷入了混乱状态。”¹涂尔干对道德的这段描述可以作为当下道德状况的一个注解。

道德究竟怎么了，是简单的人心不古的问题吗，还是说这是社会转型的所造成的必然结果？道德面临这样的困局，那么它可能的出路又会在哪里？

一、道德与社会学

社会学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源于对社会秩序的追求，源于对“社会何以可能？”问题的追问，是人们试图走出“霍布斯丛林”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其分支

¹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学科——道德社会学。道德社会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后半期，孔多塞、冯特，涂尔干等人对其产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孔多塞提出“道德科学”的概念，用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对道德问题的实证研究，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事实和推理”²两个层面上，勾勒出以历史学为导向和以统计学、应用经济学等为导向的研究方向。³此外，孔多塞的道德科学是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包括道德实践问题、学习的认知问题以及学习过程的科学组织问题。在他看来，启蒙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科学模式，那样只会把传统的宗教观念、哲学观念、道德观念以及政治观念等统统都给否定掉，⁴因此需要通过道德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同发展实现个人的道德和文明的共同生活方式的进步，建立起一个保障公民自由的共和制度、一种确保永久和平的国际秩序，以及一个加速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进而消除或补偿社会不公的社会制度。

孔多塞的思想对孔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上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于对道德问题以及社会良性秩序的关注，他通过建立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对社会的结构以及社会变迁做出了深刻的解释，并在自己的晚年提出建立“人道教”，以爱为基础，自立为教主。孔德“人道教”的思想被很多人认为是对自己建立的实证哲学的背叛，实证哲学是拒斥宗教的，因此他晚期的转变深受诟病，但孔德“人道教”的思想正是延续了孔多塞道德科学的思想，其背后是最道德问题的关注，他认为在精神领域人的最高的责任是道德责任，或者说，人的首先生活的最高形态就是对人类的爱和为人类服务。对个人来说，人类是最高的存在物，具有上帝的地位，应当对之服从和崇敬。人道教关注道德责任，其背后仍然是对社会秩序的追求，在空的看来，社会秩序的重建不能依靠政治，而应该依靠道德，因此人道教成了是“社会秩序实现有序的必要条件，是从无序到有序的合法性依据。”⁵它在以人口和财富为基础的世俗权力上又建立了一种超越世俗的权力，用于组织和协调人类的社会生活，从而避免了造成道德缺失与社会的混乱，以便建立真正人性的社会。

继孔德之后，涂尔干对道德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从而使道德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得以成立。“从《社会分工论》到《宗教生活的基本

² 伊恩·哈金：《驯服偶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P66

³ 转自龚长宇、郑杭生《道德社会学的缘起管窥》，《学术界》2008.4

⁴ 哈贝马斯：韦伯合理化理论的科学史语境，

⁵ 敬尉，《社会秩序：对人道教的思考》，劳动保障世界，2011.3

形式》，包括《自杀论》在内，他所关心的主要事情一直是解释道德的本质和道德的社会作用，以及在表达这些社会的理想时，道德生长和发展的方式。所有的这些研究，都多少与道德社会学直接有关。”⁶涂尔干首先确立了道德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道德事实，道德事实就是指客观的、实存的道德行为事实，道德行为事实是指道德行为主体在一定的道德观念支配下，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在特定的道德关系中所进行的具有善恶意义的行动。⁷在行动过程中，道德以三种主要形式起到约束的作用：①规则；②对群体的依赖③自动约束。道德即是规则的特定形式，它首先被赋予权威性，即人们感到他们应该遵循它们，他们也愿意遵循，道德规则是一个命令系统⁸，凡是违反了规则就会受到相应的制裁；其次，道德能够为行动者提供期望的目标。它不仅仅是意识的规则，它还包涵着对好的和期望的事物的理解，遵守规则会得到相应的称誉。道德是群体意识的产物，所以会形成对群体的依赖，群体的互动是道德合法性的根源，它背后隐含的是对集体的承诺，从而使得道德可以减少越轨和利己主义。自动约束意味着道德不仅仅是外部的和约束性的，它也是内部性的，需要人们发自内心的遵循它。⁹此外，涂尔干还确立了道德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因为道德事实是客观的社会事实，因此对道德事实的研究也应该遵循社会事实的研究法则，做好因果分析与功能分析，既要探询特定结果出现的前提条件，又要确定社会事实在社会整体或它所处的更大的背景中所造成的后果。¹⁰

涂尔干之后，对道德的关注成为边缘。社会学更多的转向现代性的研究，现代性的崛起与理性的扩张对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和研究对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社会学家把重点放在了对工具理性的组织与理性行动的研究上。¹¹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科层制发展的越来越完善，从而造成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不断挤压道德生存的空间，道德逐渐被边缘化。直到大屠杀之后，社会学才重新关注起道德问题，尤其是以鲍曼为主开启了大屠杀之后对道德问题的重新关注。在鲍曼看来大屠杀与现代性之间有着选择性亲和，它孕育在崇尚理性

⁶爱弥尔·涂尔干：《社会学与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序言》第2页。

⁷龚长宇、胡书芝、罗忠勇《道德行为事实：道德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年第4期

⁸ 乔纳森特纳等，《社会学理论的兴起》，侯钧生等译，p327

⁹乔纳森特纳等，《社会学理论的兴起》，侯钧生等译，p327

¹⁰ 同上 p315

¹¹ 王鹏、侯钧生，《情感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社会》2005,4

的现代社会之中，它是文明社会所遭遇的难题，而犹太人在这场事件中充当了现代性的牺牲品，¹²在此基础上鲍曼提出，现代性所承诺的美好图景已经破灭，社会学不能在将焦点集中在现代性之上，为避免类似于大屠杀事件的发生，社会学必须重新关注道德，在此基础上鲍曼考察了涂尔干的道德观：道德起源于社会。在涂尔干看来，（1）社会之外不存在道德生活，因而，社会最好被理解为道德生产的工厂；（2）社会促进了道德行为的产生，排斥、抑制或防止了不道德行为；（3）「道德控制社会」的对立面不是人类的自治，而是动物激情的统治。¹³鲍曼反对涂尔干道德产生于集体的观点，他认为道德并不是产生于社会，只是受到社会的控制，如果道德起源于社会，那么，大量非道德行为的发生都可视为「正常」社会安排功能失调的结果；如果道德起源于社会，拥有权力的罪犯就能够裁决甚么样的行为是道德的，甚么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在鲍曼的理解，道德不是社会的产物，而是属于社交范围的产物，是一种为他人负责的态度，“导致道德能力出现的因素应该到社交的（social）范围内，而不是社会的（societal）范围内去寻求。”¹⁴只有强调为他人负责，道德才能称其为道德，才能免于权力和政治力量的绑架，道德才有可能重新被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二、道德困局的形成

社会学家无论是涂尔干，还是鲍曼，他们之所以关注道德问题，都是因为道德在现实中陷入困境，如前文引述涂尔干对法国当时道德经历着骇人听闻的危机和磨难的描述，后者鲍曼对道德的关注则直指大屠杀这一历史性事件。

涂尔干认为道德困局源于社会分工所造成个人生存的原子化状态，进而原子化的生存状态解构了作为集体意识产物的道德。由于分工的精细化与复杂化，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不断增强，因此所共享的价值观与集体意识变得薄弱，个体的生存逐渐孤立并呈现原子化的状态，生产的专门化还会造成个体的分割化，总体性的个体被机械的嵌入到生产系统之中，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工具，因此在整个生产系统之中，个体的“行为意图和实际后果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而且在这个空间中还存在着其他的中间人，于是，就出现了大量没有人承担责任

¹² 郇建立，《现代性的悲哀》，《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2期

¹³ 同上

¹⁴ 王建民《建构什么样的道德社会学？读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道德与文明》2009,2

的行为。即便是善良的人，也无法直观到行为的后果，更别说到去自觉地承担道德责任了。”¹⁵个体被从集体之中放逐，以集体为基础的道德必然遭遇瓦解的命运。

道德困局的形成与现代性的崛起关系密切，现代性挟着理性主义、科层制、商品经济三把利器将道德逼向社会的角落。

理性主义是韦伯研究的核心，在韦伯看来，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韦伯将理性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种形式，价值理性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韦伯，第 56 页）而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它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在韦伯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具理性会慢慢取代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关注的是行动过程中手段的选择，而技术理性正好符合了其内在要求，而成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技术理性以机械化、大众化、非人格化为特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具化，使得它等同于人与机器的关系，“个体不用再为他人负责，也无需对集体承诺，个体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客体支配了主体，物化已经渗透到生产过程和人的心理结构之中，”¹⁶主体在这个过程中消失，因此道德责任承担的主体消失，道德成为这个时代的流浪儿，伴随着技术理性的入侵，道德的崇高性被解构，道德被迫走下神坛而不再为人所敬仰，社会上便产生“蹂躏道德”的现象，它“是指的这样的一种现象 故意将社会中的某些道德规范加以违反嘲笑和奚落将违反道德的言语和举动做得故意张扬以引人注目符合道德的现象故意加以嘲弄和羞辱以表明自己与道德的势不两立。”¹⁷

科层制是理性化的一种形式，社会的科层化也是驱逐道德生存空间的重要力量。科层制的运行原则就是理性化、专业化、分工化、非人格化，个人在科层制中根据能力的不同被分配到相应的职位中，因此个体只需依靠自己的技术完成属于自己的作为整个系统的阶段性任务，而不用关心整个系统运行的结果，加上在科层制下个人的行为与结果是相互分离的，个人缺乏对自己行为结果的控制能

¹⁵ 成伯清，《我们时代的道德焦虑》，《探索与争鸣》 2008 年第 11 期

¹⁶ 仰海峰，《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的三大主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4

¹⁷ 孙立平，《道德滑坡的社会学分析》，中国改革，2001,7

力，从而会形成科层制下对自己行为的不负责任，这种不负责任或是由于无力感的蔓延，或是由于行动的理性化，总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技术责任就会取代道德责任，个人就像机器上的螺丝钉，他只要做一个螺丝钉职责就够了，而不用去关心这个机器是用来救人的，还是用来杀人的。科层制下人与人之间是不讲道德的，讲的是纪律，是服从上级，“科层体系的普通成员完全服从于上级权威的命令而将自己看作执行上级意愿的代理人，这使得组织中的成员把自己的行为当成别人操纵的结果，进而将承担行动后果的责任转移给他人。一种连续不断、处处存在的责任转移造成的后果是造就一种“自由漂移”的责任，而当行动越中介化，即和受害者在身体与心理上的距离越远，行为就越容易变得残酷。”¹⁸

商品经济对道德的挤压主要体现在市场逻辑与消费逻辑的殖民，商品经济崇尚的是市场逻辑，它在本质上推行的是丛林法则，即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市场逻辑的殖民使得人与人之间陷入零和博弈状态，一方的获得必需是以另一方的损失为前提，人与人之间陷入恶性竞争之中。人与人的信任关系不能稳定，道德不能够提供给我们期待性的目标，因此道德不再成为关注的焦点。加之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的社会逻辑是商品所指取代商品的能指，商品所指是商品的文化附加值与文化特色，其中包括商品的构思、设计、造型、款式、装潢、包装、商标、广告等等，而商品的能指则是商品本身，所指对能指的取代造成消费的符码化，物的本质被掏空，因此物的生产本身也就被虚无化，在消费逻辑统领下的个体也因此陷入虚无的状态，在没有所谓的绝对的价值所言，物的所指与能指造成的混乱已经让个体失去了对永恒绝对价值的追求，道德的评价标准也变得紊乱，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变得很难界定。此外道德在消费逻辑和市场逻辑的殖民下还出现了被物化、商品化、功利化的趋向，道德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主流价值观，而成为市场逻辑和消费逻辑的附庸，在谈论道德的时候关注的是道德能够给自己的实际利益，道德成了市场中的工具。如成伯清认为，道德被视为是增进信任、忠诚和团结的手段，是由于目前“社会资本”存量急剧减少而被人们关注起来，却忽视了从道德作为目的角度阐发道德对人的意义。¹⁹

所以，道德困局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源于其与现代性的矛盾，现代性话语对道德形成了压迫，从而导致了道德困局的出现，何中华认为，道德危机的产生就是

¹⁸王建民《建构什么样的道德社会学？读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道德与文明》2009,2

¹⁹成伯清，《我们时代的道德焦虑》，《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1期

现代性在作祟。道德虽然在社会发展中遭遇困局，但是我们不能离开道德生存，它的出路在何处？

三、道德困局可能的出路

道德困局根源于现代性的作祟，现代性也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批判，但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现代性所造成的这些问题仅仅是启蒙主义的失败，是以主体为中心的实践理性的失败，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交往理性”，用它来取代实践理性，从而克服现代性所造成的困局，交往理性为道德走出困局也指明了一条出路。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中，行动者行动过程中依靠的是双方之间的话语交流，交往本质上就是话语形式，因此只有当话语满足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交往行为才有能成为可能。交往行为又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关联，每个行为者都会明确或不明确地提出所有三个对应的有效性要求。“在论及客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实的；论及社会世界时，陈述应是正确的；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诚的。”²⁰道德也是一种交往媒介，也可以看做一种话语形式，它的合法性也在于满足真实性、正当性与真诚性的要求。道德实践必须是真实的，道德规则的陈述必须是正当的，道德情感必须是真诚的，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有可能达致理想状态，道德也得以在交往理性道德基础之上建立起来。

对于后现代的思想家而言，哈贝马斯的理论并不能让道德走出困局，以利奥塔对他的批评为例，在利奥塔眼里，交往理性追求的是最终达成共识，他追求的还是一种总体性的元叙事理论，仍然延续的是启蒙主义的道路，他并不能让道德问题走出困局，而是走入新的元叙事危机中。总体化的个体已经走向灭亡，消解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遵循的是不同的知识原则，在这样的条件下，以达致共识为目标的交往理性是不可能为道德指出可行的道路。在利奥塔看来，“消除共识，强调异质性，放弃对统一历史和主体的妄想，放弃启蒙道路”²¹或许是最好的选择。相应的，道德困局的出路也在于放弃对总体性的追求，放弃对元叙事的追求，强调差异性，他将这样的道德归到审美的快感之中，并从微观的角度解读后现代道德，“通过审视正义与真理、道德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冲

²⁰ 李佃来，《哈贝马斯与交往理性》，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02 第 5 期

²¹ 秦喜清，《让-费·利奥塔：独树一帜的后现代理论家》，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年：2002-8

突和分歧,强调道德命令并不产生于对人性、社会性和上帝意志所作的非道德真理的认识,而是取决于由欲望、形象、事件和纷争构成的微观政治王国”。²²

我们究竟从何处寻找失落的道德,重新建构起我们的道德。无论是哈贝马斯还是利奥塔所给出道路并不能很好的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当一个事物在运行过程出现问题了,我们最好的方式是从它的源头寻找原因。作为道德社会学的创立者,涂尔干在其晚年对道德困局解决所提出的见解仍有重要的意义。在涂尔干看来,我们必须依靠道德教育才能帮助道德走出困局,为此他提出了建立职业群体的方法,利用职业群体承担如下功能:①动员个人承诺;②强化信仰和价值;③将个人整合入集体。²³但是仅有这些似乎还不够,我们还必须从微观角度为道德找寻可能性。在此,鲍曼“为他者的道德”正好提供微观互动的可能,在职业群体之内,人与人通过建立为他者负责的道德倾向,“为他者负责”是对他者的健康和尊严负责,在鲍曼那里,真正的道德应当采取“为……负责”的模式,因为道德的“原初场景”是“面对面”(face to face)的领域。²⁴这样通过鲍曼“为他者负责”的模式,在职业群体中建立起“面对面”的原初场景,是职业群体中成员一方面在宏观上形成对集体的依赖与承诺,形成稳定的信仰与价值,并将其内化,成为自我控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微观角度通过个人之间的互动,建立起为“他者负责的模式”,尊重他人的健康和尊严,并在此过程中将内化的集体意识在微观层面释放,从而在职业群体之内建立起道德的稳固基础,为道德走出困局指明道路。

参考资料:

- 1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 2 伊恩·哈金:《驯服偶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P66
- 3 龚长宇、郑杭生《道德社会学的缘起管窥》,《学术界》2008. 4
- 4 哈贝马斯:韦伯合理化理论的科学史语境,哈贝马斯 曹卫东 译,《哲学研究》
- 5 敬尉,《社会秩序:对人道教的思考》,劳动保障世界,2011,3

²² 莫伟民,《试析利奥塔的后现代道德思想》,天津社会科学 2007年第6期

²³ 乔纳森特纳等,《社会学理论的兴起》,侯钧生等译,p324

²⁴ 郑莉,《鲍曼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2期

6 爱弥尔·涂尔干：《社会学与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序言》第2页。

7 龚长宇等、《道德行为事实：道德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年第4期

8 乔纳森特纳等，《社会学理论的兴起》，侯钧生等译，p327

9 王鹏、侯钧生，《情感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社会》2005,4

10 郇建立，《现代性的悲哀》，《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2期

11 王建民《建构什么样的道德社会学？读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道德与文明》2009,2

12 成伯清，《我们时代的道德焦虑》，《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1期

13 仰海峰，《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的三大主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4

14 孙立平，《道德滑坡的社会学分析》，中国改革，2001,7

15 李佃来，《哈贝马斯与交往理性》，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02 第5期

16 秦喜清，《让-费·利奥塔：独树一帜的后现代理论家》，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年：2002-8

17 莫伟民，《试析利奥塔的后现代道德思想》，天津社会科学 2007 年第6期

18 郑莉，《鲍曼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 年第2期

作者简介：曹金羽，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